

新人文对话录丛书

韩少功

王尧

对话录

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SUZHOU UNIVERSITY PRESS

新人文对话录丛书

王尧 林建法 主编

韩少功

王尧

对话录

Talking

苏州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韩少功王尧对话录/韩少功,王尧著. - 苏州: 苏州大学出版社, 2003. 11

(新人文对话录丛书/王尧,林建法主编)

ISBN 7-81090-208-3

I. 韩… II. ①韩…②王… III. ①文艺批评-中国-文集②文化-评论-中国-文集 IV. I206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5218 号

韩少功王尧对话录

著者/韩少功 王尧

责任编辑/陈长荣 朱坤泉

出版发行/苏州大学出版社

(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215021)

经销/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刷/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/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/163 千

印张/8.25

印数/1-10000 册

书号/ISBN 7-81090-208-3/I·8

定价/15.50 元



莫克少功

总序

王尧 林建法

我们想在“对话的时代”以“新人文对话录丛书”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，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。

20世纪90年代那场未果的“人文精神”讨论，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。这一分歧，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，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。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，在这样的现实中，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。对中国的、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，一直有仁智之见。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“人文主义”这个词，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的，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，“人文主义”的定义不尽相同。所以，“人文主义”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，看似约定俗成，但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。“人文”就字面而言，中文与西文相仿。《易经》云：“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显然，“人文”的中西涵义有差别，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“人文”涵义也有差别。因此，有学者建议不妨把“人



文主义”译成“唯人论”或“人学”，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。正因为是“人学”，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。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“人文精神”存在着分歧，对西方“人文主义”也有不同的理解，但是不管怎样，“人文知识分子”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，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作出深刻的反省，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。这样的解释、反省与判断，不仅可以看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，思考路径的异同，而且也可以分别出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。

因此，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结点，寻找出相同的话题，就像美国的《人文》杂志所希望的那样，“不同学科的写作，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、普遍的思想核心，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，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”。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，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、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，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，而且过于自信。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、遭遇的问题，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，去思和想。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，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、现实和未来，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，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。也许，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



的底线，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出他的立场。掩饰也是一种立场。从这个立场出发，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，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，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，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。“新人文”对话录之“新”，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，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所做工作的期待。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“新人文”这一提法，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，但是它不在“保守主义”和“激进主义”之间徘徊，也撕去了“左翼”和“右翼”的标签。

在这套对话录丛书策划的过程中，我们（“我们”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）首先感觉到我们一些所谓的“人文知识分子”，其实愧对“人文”二字和“人文知识分子”的称谓，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，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，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。事实上，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，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，那么，所谓的“批判”和“创新”也就成了一句空话。这么多年，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、止步藩篱的教训。所以，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。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，基本上是“人文知识分子”一类。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，几乎都讨论到“知识分子”问题。尽管大家对“知识分子”有大致相同的理解，但都非常谨慎地

使用“知识分子”这一概念。一些朋友不敢轻易地称自己为“知识分子”；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“知识分子”相称，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。由这套丛书的“思想状况”，大致可以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。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，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，在一定意义上，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对话者的精神自叙。西方哲人说过，一些人是发现真理，一些人发表意见。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，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。

这样一点自我认识，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。试图推动对话文体发展，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。那种面对面的对话，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，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。也许，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，但是，对话因此而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，因此而与其他文体相区别。正是在对话之后，我们发现了对话的不易。所以，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，作为主编，我们由衷地感谢应邀参加对话的朋友们，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以及负责此项工作的陈长荣先生，感谢喜欢和不喜欢这套书的读者。读者也是我们的对话者。

IV



经历篇

3

“文革”：在妖化与美化之外

37

启蒙：个人的解放与茫然

71

再启蒙：社会的裂缝与重建

河学篇

107

符号：是游击战还是游乐场

141

语言：展开工具性与文化性的双翼

181

历史：现在与过去的双向激活

215

文学：文体开放的远望与近观

24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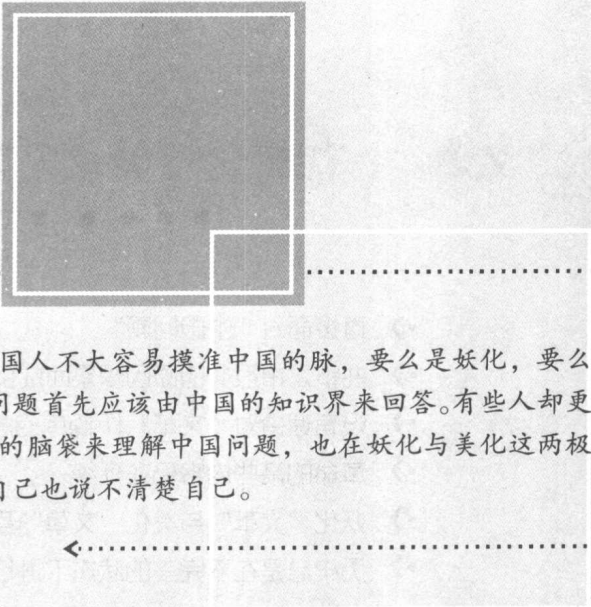
后记

经历篇



经历篇

“文革”：在妖化与美化之外



很多外国人不大会摸准中国的脉，要么是妖化，要么是美化。但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由中国的知识界来回答。有些人却更习惯于靠外国人的脑袋来理解中国问题，也在妖化与美化这两极之间“翻烧饼”，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。

“文革”：在妖化与美化之外



- > 直接面对“中国问题”
- > 曲折是由很多的原因积累而成的
- > 没有理由对“文革”作简单的想像
- > 革命的某些内容仍在延续
- > 妖化“文革”与美化“文革”互为因果
- > 历史总是在不完美的状态下进行的

直接面对“中国问题”

韩少功：我从北京来，说要到苏州去，北京的很多人就知道是参加“小说家讲坛”活动。可见这个活动已经很有影响，对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，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。以前似乎没有人这么做过。

王尧：也有，但没有这么集中，没有这么大的规模。我在讲坛开幕时的致辞和后来为“小说家讲坛”丛书写的序言中都提到，这个讲坛的设立，是为了彰显小说家们被遮蔽掉的意义，同时也想冲击一下体制内的文学教育。

韩少功：对作家作一个深入和系统的研究，引导学生去理解这些作品，理解这一段文学史，是很有意义的，对海外汉学界的有关研究也有启示。据我所知，很多外国的读者和研究者也关注这批作家，但苦于把握不住研究的途径和线索，而你们整理的这些演讲与对话，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现成的渠道，建起了一座很好的桥梁。你们的计划是雄心勃勃的。能够坚持到现在这一步，把这件事情做下来，说实话，有点出乎人们的想像。

王尧：在办讲坛的过程中，我们都觉得有些问题还要展开讨论，这不仅是创作的问题，也不仅是创作的思想文化背景问题。在今天，如果我们还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话，就不能不面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种种现象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东西。坦率地说，我是有焦虑的——现在用这个词也许不合时宜。我觉得，我们需要表明我们的人文立场，包

括困惑。我知道，你在90年代初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了。

韩少功：说老实话，能够听到你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其本身就令人感到高兴。

曲折是由很多的原因累积而成的

王尧：我还是比较赞成王晓明先生的看法：远离当代生活的批评，是没有生命力的。我想，我们不必把“当代”的概念仅仅理解为“当下”。其实，“当代”也是各个阶段的延续，而不是中断。譬如，在“当代”之中，“文革”是一个非常大的复杂的历史事件；可能不仅是现在，即使在以后，如何叙述这段历史也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这几年，关于中国“现代性”问题的分歧，在一定程度上与对“文革”认识的差异有关。

韩少功：我觉得现在对“文革”有一种肤浅的认识，就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偶然的悲剧，是一些坏人做了一些坏事。这个理解就太简单了。

王尧：道德化、简单化地解释当代中国，在一些人那里得心应手。

韩少功：中国的历史发展到这个时代，很多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，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，最后形成了一个疑难杂症。大致而言，宋代以后，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遇到了新的情况。首先，中原的农耕文明不敌北方的游牧文明，蒙古、突厥等族群集团越来越强大，文明中心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，北方的边界线也越来越向南撤退。这以后出现过两次大的外族入侵，虽然促进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，但以汉代“和亲”为标志的稳定的外部环境趋于瓦解，中央帝国的朝贡体系趋于崩溃，周围一些附属国有了离心趋向。王安石等知识分子有过种种改革和复兴的愿望，但已经为力所不逮。后来虽然有过明、清时代几次短暂的修复和喘息，但整个国势是逐渐往下走的，到了晚清已经是陷入深重危机，政权腐败，民生凋敝。正是在这个时候，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也日趋尖锐。晚清时期，全国人口三亿多，有一说是四亿多，是欧洲 6000 多万人口的五六倍，对于当时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来说已经不堪重负，各种社会矛盾不可能不激化。第二个原因，自鸦片战争以后，出现了中西方文明的碰撞，列强的“坚船利炮”打进来了，西方的资本主义、民族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也涌进来了，迫使中国接受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，完全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。这就像生物入侵一样，很多陌生的物种贸然闯入，没有它们的天敌，没有能够与之互相制约的物种，于是无限地扩张蔓延，加剧了社会和文化的无序程度，提高了危机的代价。紫茎泽兰在美洲危害不大，到中国来就是灾祸。食人鱼在非洲也危害不大，到中国来同样是灾祸。为

什么？这是由于原有的生态平衡不一样，生物入侵以后要实现一种新的生态平衡，往往需要经历一个混乱而痛苦的过程。西学东渐也是这样。中国人在 20 世纪上半叶选择了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是西方的一种左翼思潮，来源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，来源于更早的宗教理想。犹太教中就有共产主义因素，作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恐怕不能不受其影响。现在以色列还有公有制的很大地盘。基督教的旧教和新教中也有共产主义因素，早期乌托邦的设计者康帕内拉等，大多是一些基督教人士，把教内的平等意识移植到现实社会中，构造了世俗的空想社会主义；然后马克思更进了一步，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给予了解释，用资本论构筑经济学的基础，把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。这个思潮在欧洲发挥了重大作用，现在北欧的、西欧的发达国家，其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造，其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，无不受益于社会主义运动。拿破仑法典是禁止工会与罢工的，工会权与罢工权是后来通过斗争而取得的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西方的八小时工作